

# 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韩可胜： 节气，是最大的自然

本报记者 李纯一

访谈录

传统文化如何转换成世界语言？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冬奥会的开幕式，设计了以二十四节气来倒数时间的短片。全世界的观众在大屏幕上看到，“处暑”节气的画面，是一个满头大汗练习冰雪项目的男孩，汗水从他的下巴滴落。这个咬紧牙关的孩子，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直白展现，而画面选配的诗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相信会击中每一个中国人，也会击中每一个经历过人间四季、成败起落的奥运观众。

多年来致力于传播节气文化的韩可胜，对二十四节气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发现很多人认为节气就是风花雪月，写起文章来只谈花花草草；还发现很多人认为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当代生活中，节气已经无甚意义。本报近日采访了韩可胜，请他谈谈节气何以仍与我们相关，谈谈中国人从自然中收获的智慧如何仍有益于当今世界。

**文汇报：**通常认为，二十四节气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经验。因此，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和物候条件下的人，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要将之转换为世界语言，面对全球观众，更是难上加难。您作为文化学者，如何评价冬奥会开幕式对二十四节气的讲述？

**韩可胜：**首先要说，“二十四节气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经验”，这话是不准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有个准确的表述：“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对二十四节气的很多简短判断，都不能准确体现二十四节气的本质。

二十四节气首先是关于太阳运动的知识，是天文学知识。明代大学者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落乌啼’，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古人不断培养强大的观察自然的能力，才能在大自然中相对顺利地生存下来。

节气是一个时间知识体系。为了指导生产生活，中国人逐步发现了节气。从最早的“二至”（冬至夏至），到“二分”（春分秋分），再到“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古人把一个太阳年平均分为24段，就是二十四节气。但其实，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是一个椭圆形轨道，地球在近日点上公转得快一点，在远日点慢一点，所以节气其实不是严格均分的。

明代西方天文学知识传入后，徐光启引入黄道概念，重新测节气。1645年清廷颁立新的二十四节气，沿用至今。

“节”本义是“竹节”，“气”本义是“气”。这24段，也就是24节，都有各自的气象、气候、气质。中国人信仰天人合一。节气既是天，也会影响到人，所以，人的生活，乃至命相都会受到节气的影响。节气是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在这个体系中展开。不仅种田，结婚、造房子、看风水、安葬先人、开张奠基、走亲访友，甚至古人算命相……每一个农历日子的背后都离不开节气。农历是阴阳合历，是阳历的“二十四节气”和阴历的“月”的结合体。

二十四节气经常运用于农耕，在农耕文明中得到反复检验，也在农耕文明中得到发扬和完善。但如果说“二十四节气”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经验，很容易得出推论，现在不是农耕社会，节气已经过时了。其实不然。新华社有一段报道，我觉得写得很好：“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界认知的独特性及其实践活动的丰富性，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节气，是最大的自然。

冬奥会用一种令人惊艳的方式，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还有节气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时间知识体系”；它传达了中国人的一个理念，即自然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美美与共的伙伴，不是征服、改造的对象。节气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就此可以说，我们时时都在与自然共生。

**文汇报：**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也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如日本，将之稍加改造，同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器物联系起来，且加入了不同地方的不同风物。曾有学者表示，现代中国人似乎更强调血缘和姻亲，相对忽视地缘。就这一点而言，有必要向韩国和日本学习，运用传统节日增强“地缘”情感。您在传播二十四节气文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体会？

**韩可胜：**东亚地区，汉文化圈，都是基本符合节气特征的。与节气类似的，比如梅雨，中国有梅雨现象，日本也有。所以这些国家相对容易接受中国的节气体系乃至一些观念。不过他们的传播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岛国，对“土地”“地缘”的意识强，有他们文化的因素，也有他们现实的考量。

中国人也是非常重视“土地”和“地缘”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像“落叶归根”，包括“春运”都与之有关。只是当代社会，因为各地发展的不平衡，生存和发展机会会有差异，人员高度流动，部分破坏了地缘观念，特别是传统乡村的大量消失，让很多人的乡愁“无处安放”。但是，流动在外，也有强化地缘观念的一面。像今天有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是讲述地方故事，乃至用方言讲述，深入人心，这就是人们仍然执着于地缘认同的体现。

中国很大，气象结果不可能完全同步。岭南早已春雷隆隆，塞北还是雪天冰天。节气在北方和南方，会或晚或早一点，但也是被广泛认知的。《淮南子·天文训》第一次完整表述了二十四节气，其基准点正是秦岭—淮河一线，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以此为基准，南方的“节气”可以依次提前，北方的“节气”可以依次推后，都能有个参照。

我们确实可以多多利用节气，让现代人在感受时间变换的同时，对自己所处的地理有更深的理解，增进对地方的情感和认同。像现在，读南宋文学家、教育家张栻写的“律回岁晚冰霜少，春



明 唐寅《春雨鸣禽图》  
“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降。”

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样典型的长江流域的立春场景，是不是就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欢喜？其实十几年来，我在福建、四川、安徽、山东、甘肃，也都讲过节气。“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在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分界线上，在玉门关讲节气，也别有韵味。

**文汇报：**中国还有很多非遗，收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除了农历二十四节气，以及我们较为熟悉的书法、篆刻、剪纸，还有许许多多民族的就具有极强地域性的文化艺术，如藏医药浴法、蒙古族的呼麦、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大西北的花儿、福建南音等。如何挖掘各地传统文化艺术中的审美与价值，使之穿越古今，共同构建今日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

**韩可胜：**绝大部分非遗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在发挥作用，共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讲：“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具有科学的价值理念，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二十四节气是很特别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晚清之后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但这只是世界文明此起彼伏的一面。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见证。了解珍惜自己的传统，“自爱”，是“自信”的第一步。

我生在、长在皖西南山区。每到春天，我就想起父亲念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父亲在惊蛰、春分时节教我的诗词。不管我走到哪里，总是记得几时的场景，追着父亲问“剪刀”呢，“二月春风”怎么“似剪刀”——这样美好的、有爱的回忆，我一生都记得。你爱什么，爱家人，爱故乡，爱祖国……都不是虚无缥缈的，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和载体。而文化传统，包括诗词歌赋，包括传统艺术，就是这个指向和载体。

**文汇报：**奥运会的核心文化元素仍是现代的、充满活力的——像冰墩墩，戴

上冰雪运动头盔，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日本在“东京8分钟”和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剪纸、法国在“巴黎8分钟”里展示的铸皮屋顶，这些都是他们一百二十年来重新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您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开掘近现代的文化资源，我们的文化产业应该如何打造风靡全球的符号？

**韩可胜：**文化有一个二律背反。就是既要讲传承，也要讲创新。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讲：“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符号，进行没有根基的创新，要么是“一时之新”，很快就烟消云散；要么是“模仿之新”，说到底还是抄袭别人的。既要扎根于自己的东西，又要有创新，这要求是很高的。

“巴黎8分钟”里，运动员在各种建筑的屋顶上穿行，带领观众深入城市，认识巴黎。巴黎85%的屋顶都采用铸皮，从空中俯瞰，随着光影变化，呈现出极富层次感感的银灰色，这使得屋顶成为巴黎城市标志之一，也赋予了巴黎最美城市天际线的美名。铸皮屋顶现代吗？我想也不算现代，都快两个世纪了；但这也不是通常说的传统，而是他们重新发明的传统，近现代的传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长期保持稳定的奇迹，将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在一个奋发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定会孕育出我们今天意想不到的文化符号。

文化自信不会孤立存在，总是与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和国力强盛结合在一起。前些年美国电影人演绎出来的“功夫熊猫”，就是我们两种文化符号的成功化合。如果我们创造力再提升一些，能代表中国元素、又曾影响世界的符号太多了，比如推动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指南针”，推动了知识传播和普及的“印刷术”和“造纸术”……这些被广为接受的事物，都来自中国，而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外国人知道这些历史了。作为中国人，你不告诉世界，谁告诉世界？

## 二十四节气以哪个节气为起点

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有趣的是，对于节气的起点究竟在冬至还是立春，一直存在争论。所谓“立竿见影”，最容易被发现的节气，是影子最长时候的冬至和影子最短时候的夏至。人们最早发现的节气就是冬至。如果按重要性排序，冬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气，没有之一。冬至是最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完整记录节气的《淮南子》也确以冬至为起点。

但是，节气一般不单独使用，节气是干支历的一部分。干支历，是春夏秋冬为序，“斗柄回寅”为“春正”（正月），这是夏历的历法。汉朝确立了这一制度，春夏秋冬的顺序也确定了下来。于是与之配套的节气，自然就依照了这个顺序。农历年，是阳历的干支年和阴历的月相结合的产物。

在历法中，年比节气大。节气服从年。年以春开始，节气立春就成了二十四节气之首。所以，说立春是节气之首，不仅仅是习惯，而是历法体系的整体性决定的。我们的节气歌从立春开始，正是这一历法体系的体现。

# 北四川路的左联文艺往事

俞宽宏

1929年初中华艺术大学搬迁到寰乐安路233号，使北四川路融汇成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心。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之后，文委相继组织成立了社联、美盟、剧联和文总，形成了统一的左翼文化阵营。

20世纪20年代末，北四川路这条苏州河北岸半租界现代街区，是南京路和福州路之外最为繁盛之地，“日夕车辆云集，行人拥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年，基于中共四大召开之后这里浓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氛围和深厚的工人运动基础，借助这块连接全球贸易的桥梁，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大批左翼文化学者、作家和共产党人，把创造社和中华艺术大学迁移至北四川路底，在这里创建了太阳社、我们社、朝花社、艺术剧社、时代美术社、大道剧社和其后的野风画会，出版了大批左翼期刊、新兴社会科学著作和其他进步译著，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在此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左翼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以左联、剧联和美联活动为中心，斗争近十年，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时代新篇章。

“四一二”后，夏衍最早从日本回来落脚北四川路。洪灵菲和戴平万9月从南洋流亡到上海，后辗转住进北四川路鸿庆坊，之后同林伯修等潮汕籍文化人在这里创办了我们社。“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等人从武汉回到北四川路，在此开办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与此同时，茅盾于8月下旬从庐山回到上海秘密住进景云里；10月上旬和下旬，鲁迅、郭沫若分别从南方回到北四川路底。1928年2月，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和孟超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创办太阳社，活动在这一带的郁达夫、洪灵菲、戴平万、王任叔、楼适夷、刘一梦和殷夫等人先后加入，形成了一支由两个党小组、20余位共产党人组成的

文化生力军。

成仿吾7月底借为黄埔军校采购军用品之机回到上海，9月赴日本动员一批年轻学子回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最早一批回来的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人会同国内外各地来到北四川路的郑伯奇、阳翰笙、李一氓、段可情、王学文、沈起予等人，构成了后期创造社的支柱力量。1928年初创造社搬进北四川路，经过酝酿，“决定采取两道防线，一方面新发刊理论性的刊物《文化批判》，宣传马列主义的学说，战斗在第一线。《创造月刊》则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将重点转到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创刊号出版，《卷头语》豪情满怀，“革命文学”的号角就此吹响。同日，停刊半年的《创造月刊》出版，郭沫若在此发表《英雄论》。郭文认为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号召进步文化工作者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冯乃超在创造社《文化批评》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分析了当时最新发展的五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之后，新出版的《创造月刊》刊载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为回应太阳社和创造社，3月12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醉眼”中的朦胧》，拉开“革命文学”论争的帷幕。这场“革命文学”论争，历时两年之久，余绪一直延伸1932年下半年。不仅旗鼓相当的“革命文学”倡导者阵营和《语丝》派阵营发表了意见，很多局外文化学者、无政府主义者和

少数几位国民党御用文人也谈了各自立场观点，使“革命文学”影响在上海和全国迅速扩展开来。这场文学论争如一声春雷，给暮色沉闷的文化界开辟了一块“革命文学”的根据地，加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展开，在北四川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左翼文化舆论场，就连乐群书店经理张资平这样擅写情爱小说的作家也纷纷“转向”，林语堂在此出版了《剪拂集》。大江书铺、水沫书店、南强书局等进步出版机构纷纷在此成立，左翼期刊和新兴社会科学著作不断涌现。

尽管在租界和半租界内，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管理存在缝隙，但白色恐怖仍然十分残酷。1928年在北四川路上创刊的《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都不超7期被封，《流沙》《日出》《思想》《时代文艺》等文化期刊存在时间也不长。

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和我们社的晚山书店相继被国民党查封，加上之前被封的春野书店，使得原先集聚在这些出版机构下的左翼文化人发生分离。白薇、沈起予和其后的段可情等人因生计问题离开北四川路，入党之后的彭康、李初梨等人则转向了“实际的地下斗争”。但另一方面，柔石、冯雪峰、沙汀、任白戈、石凌鹤等后起左翼文化骨干先后来到北四川路，进一步充实了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力量。

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文化事业的领导。1928年5月江苏省委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党团，7月成立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1928年12月底，受文化党团委托，钱杏邨、冯乃超邀请张师等人在北四川



“左联”会址纪念馆

路横浜桥附近的广肇公学发起成立“中国著作家协会”，这是中共领导文化统一战线的一次有益尝试。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10月中央军委成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局面。

1929年初中华艺术大学搬迁到寰乐安路233号意义重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所民办大学，学生大都是大革命失败后集聚在上海的进步文艺青年，“在教授和教员之中，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最著名的左翼文化名人，如彭康、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沈起予、华汉（阳翰笙）等同志均在该校担任教学工作”。中华艺术大学很快成为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枢，使北四川路融汇成了一个影响全国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心。

1929年下半年，许幸之、沈叶沅、石凌鹤和司徒慧敏等人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使上海左翼文艺思潮开始由初期的文学领域逐渐向左翼戏剧、美术领域渗透。这年6月艺术戏剧社在永安里成立，在党领导下，“公然打起了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对于中国戏剧运动发生过非常强烈而又较为深远的影响”。艺术戏剧社的文艺骨干都是原创造社社员和上海艺大学生，他们在这里大力开展左翼戏剧实践，创办戏剧培训班和《艺术》《沙龙》杂志，于1930年春举办了两场引人注目的公演，直接影响了上海戏剧的发展趋势。1930年3月19日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成立，加上之后南国社、摩登社的迅速左转，中国左翼戏剧发展形成滔滔之势。

许幸之是1929年下半年应邀回国担任中华艺大西洋画科主任的。1930年2

月24日，他和沈叶沅、王一榴等人在北四川路底发起成立“时代美术社”。时代美术社组织漫画会和苏联革命美术图片展，开展了多项左翼美术活动，掣开了中国左翼美术事业发展的处女地。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内成立。左联是文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广泛团结当时上海文化界思想最激进的一批文化人，其编辑出版的《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等机关刊成为文艺界的“洋林革音”。左联之后，文委相继组织成立了社联、美盟、剧联和文总，形成了统一的左翼文化阵营。尤其是美盟和剧联，其机关就设在北四川路上。左联旗手鲁迅一直住在北四川路底，加上左联成立前后冯雪峰、田汉、蒋光慈、柔石、郑伯奇、林伯修、安娥和其后的丁玲、周扬等人在这里的文化活动，使这里的左翼文化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九鼎鹤声”。

北四川路左翼文化运动的活跃，引来国民党更加严酷的打压。基于艺术剧社3月22日在上海艺大剧场公演产生的巨大影响，国民党于4月28日出动军警对艺术剧社进行查封。5月24日，国民党又查封了中华艺术大学，这里的左翼文化运动被迫全部转入地下。1931年1月17至18日，经常生活与活动在北四川路上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先后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惨遭杀害，这是左联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左联“五烈士”事件使北四川路的左翼文化运动损失惨重，间接导致李初梨、

王任叔等左联盟员被捕，马宁、许晓、魏金枝先后被迫离开上海，杜衡、戴望舒等人不再参与左联活动，周毓英、叶灵凤因参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被左联开除。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在党的领导下，左联于血泊中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这年2月，冯雪峰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一上任就同鲁迅商量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此刊4月20日编定，7月出版，使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了国际性影响。

与此同时，左联着手调整策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整顿战”。之后北四川路先后迎来了楼适夷、艾芜、叶以群、周文、韩起、胡风等左联骨干，左联机关也转移至此，左翼文化在这里迎来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新局面。因为秘密盟员宣侠夫的资助，1931年秋天，左联在北四川路路创办了湖风书局、《北斗》和左联秘密机关刊《文学导报》。这些出版机构和刊物的运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左联在北四川路创办机关刊《十字街头》。

文学发展的同时，左翼戏剧、美术也在北四川路的艰苦环境下推进。1931年1月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艺坊成立的剧联及其影响下的大道剧社，在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运作艰难，但仍致力在高校和工人之间开展左翼戏剧活动，取得成绩。另一方面，1931年初许幸之离开上海，江湾路“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扛起了左翼美术旗帜。1931年夏，鲁迅在长春路开设现代木刻讲习班，从这时起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不仅自己大量自费出版左翼画集，多次在这里举办木刻版画展，还屡次应邀到公园坊里的美联野风画会做演讲，使北四川路成为中国左翼美术发展的一块最坚实的基地。

（作者单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第494期